

學者的真實與苦澀

——讀《靜如文存》品「評文紀事」

◎ 皮學軍

捧讀《靜如文存（上下冊）》（張靜如著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1年9月版），有一種異樣的欣幸。原來，該書除了正文外，每篇文章背後還附有「評文紀事」。它主要記載了該文的寫作背景、作者當時的心境（或合著情況）、作者日後對該文的評價。各「評文紀事」與其正文交相輝映，使作者的觀點、理論更趨合理、完整。其內容既有生活的愉悅，亦有工作的煩惱；既有尖刻的批評、深刻的自省，又有溫和的勸慰、淡戚的悲憫；既有桃李滿天下時的自我陶醉，又有勉為其難的困惑與思想行為受制時的愠怒。其字數多則上千，少則幾十，字裏行間，均流露出了作者的真實心聲。

張靜如（1933-），北京人，中共黨員，現為北京師範大學教授、博士導師。其專攻中共黨史、李大釗、毛思想、鄧理論等。其自小酷愛歷史，長大後入輔仁大學（後併入北京師大）仍然學歷史，因對太平天國史甚感興趣，故被同學戲稱「專家」。畢業後，走上學術之路，寫過不少文章，與人合著過《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反對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鬥爭》等。但「文革」一來，就進了勞改隊，「解放」以後，也只是當「逍遙派」，燒燒鍋爐，下放農村時也「不敢高聲語」，「甚麼事都做不成，雖然研究中醫，也沒有條件幹下去。」（P22）熬到紅太陽隕落、「四人幫」垮臺後，才又「卷起農奴戟」，重操舊業。

靜如先生是位有良知的、真實的學者。幾十年學海泛舟，唯求客觀、公正，先後撰文為李大釗、陳獨秀、劉少奇等平反，又時時不忘反省、總結自己在學術上的得失。其在1999年編《文存》時，對以往論點都有明確的說明或補充，如在《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》中，說這是他自1966年以來第一次公開發表的文章，但只能署教研室的名字，因為「1958年以後，逐漸形成一種不能突出個人研究的氣氛，任何成果都是集體的。」（P11）該文「今天看來，觀點基本是對的，也有些提法不妥當，特別是在形式上、語言上完全是當時寫文章的特點。」儘管「缺點」「十分明顯」，但為了「反映一下當時的水平」，還是「留點歷史的痕跡」。在《論五四運動時期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》的「評文紀事」中，很懇切地說：「因為發表較早，有些說法現在看來還要改變，事實上在我後來的文章中，已作了不少更正」。（P49）

他也是位正直的學者，凡是人家起草、自己修改的文章，都在「評文紀事」中交代得一清二楚。凡人家文中、書中的缺點，都毫不吝嗇地批評，他說：「很多書評給人的印象只是捧場，沒有認真批評……希望學術界能克服一下書評中的不良風氣，以利學術的發展。」（P100）「有的學者很在乎自己的對錯，其實也沒有什麼，對了當然很好，不對改了就是。這類事，我覺得不必隱諱。」（P821）「我們應該大力提倡學術批評，以促進學術的發展。」（P544）他對自己文章的缺點也毫不掩飾，「文中講到黨的十五大對毛澤東思想解放

時加了『建設』字樣，其實黨的十二大就加上了，我寫文章時沒有查，弄錯了，這是很不應該的。」文中說，在這本書出版前還沒有一本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寫汪精衛傳的，這話說得不準確，說明我孤陋寡聞。」（P544）

張老痛恨封建主義，認為「經過『文化大革命』，深感封建主義思想在中國社會上影響太大了。」一定要清除那些與現代化格格不入的封建意識。其一針見血地指出：「有些人一方面享受著現代化建設的成果，另一方面卻又拼命維護封建主義意識。」（P64）確實，改革開放都二十餘年了，有些人仍念念不忘封建式集權，照秦始皇之例，自封為「第×代」。他們明明知道「文革」時的「最高」、「萬萬歲」、「一句頂一萬句」是封建糟粕，卻又偏偏把自己的「三個」奉為《聖經》，到處亂套，要求普通百姓也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染塵埃」（佛教禪宗偈語）。李澤厚先生曾經生動地說：「很遺憾，五六十年代學哲學，學會了許多條條框框，什麼唯物主義四點，辯證法三條，到處去套，自以為甚麼問題都可以解決，其實毫無用處。於是，越學越蠢。」（李澤厚：《探尋語碎》，上海文藝出版社，2000年版）相比之下，二者有何異呢？看來，靜如先生是走出來了，而且走得很遠。但「萬山不許一溪奔」（典出楊萬里詩），故其時常慨嘆：「可見當時（為李大釗）平反之難。」（P31）「可見解放思想不那麼容易。」（P85）「可見只有解放思想，才能促進學術研究的發展。」（P110）

他又往往於行文走筆之中，放出「空谷足音」：「為甚麼有的人很有錢就感到生活空虛呢？就因為缺少點精神。」（P208）「我認為，要實現社會現代化，必須使人具有現代化意識。」（P624）……。

「評文紀事」有時也流露出作者的成就感，一方面滿足於自己的文章：「這是我自認為寫得比較好的序，因為它說了一些真話，既說了稱贊這本書的話，也說了批評這本書的話」。（P544）另一方面，陶醉於自己的栽培之功：「本書作者（丁曉強）是我的第一屆博士生，現在是浙江社科院的研究員。」他還如數家珍般地抖出其高足：「我的博士生已是教授的還有高力克、關志綱、侯且岸、朱志敏，丁俊平還當上了博導。看到自己學生的成長，感到自己沒有白廢勁。」（P742）真有點象《四世同堂》中某老太爺見到自家人丁興旺時的那種滿足。

但「評文紀事」中更多的是無奈、困惑與愠怒。

1989年，在天津開學術研討會時，日本友人齋藤道彥「聽說中國沒有肉吃」，為之捎來些肉腸。這令張老哭笑不得，「可見，在國外總是亂傳。」（P624）

市場經濟下，部分人想商海弄潮，故「基礎學科的發展要受到一定的限制。」張老以為「這是社會由低生產力向高生產力發展過程中，不可避免的現象。」因此，他坦言：「人各有志，如另有高就，誰也不要勉強留在作為基礎學科的中共黨史學這塊苦地盤上。」（P716）這對一直執著於自己學術領域（中共黨史）的張老來說，無異於「天要下雨」的無奈。愁啊！愁？！

生活的不順，靜如老人可笑對：學術的爭論，可以在息怒之後和好；撰文時的「挂一漏萬」，可以不斷補正。唯一令他不能容忍的，就是在「枷鎖」中的掙扎。

1984年，張老在河北樂亭縣主持召開「李大釗誕辰95周年全國學術討論會」，但個別黨政領導沽名釣譽，大行官僚主義，令他陡生怒氣，「由於我看不慣黨政領導中一些人的做法，因而得罪了他們，弄得不愉快。」（P390）

言論與學術的不自由，常常是跳不出「人亡政息」等周期律的惡果。1945年，黃炎培與毛澤東在延安就討論過這回事，毛當時還對未來新中國的「民主、自由」充滿信心，認為新中國一定能跳出周期律（見黃炎培著：《延安歸來》）。但建國後不久，就爆發了「靈魂深處的革命」，許多《憲法》中規定的「自由」都被我們「偉大的導師、偉大的領袖、偉大的舵手」毛主席的「破雨傘」（典出1970年毛澤東與斯若的談話，原文見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》）撐得無影無蹤。那些「忠於毛主席」、「忠於黨中央」的「無產階級勇士」把成千上萬的「右派」、「走資派」打得死去活來後，自己卻想當「主席」，當「女皇」。當年，江青、王洪文等人還照過標準像，準備當政後讓人敬、讓人拜。結果呢？被碾得粉碎。事實證明，絕對「忠於」的奴才實際上是中山狼，而給黨提意見的人，如彭德懷、張聞天等才是真正的同志。但不知怎麼的，我們這個講「實事求是」的體制，歷來只聽得好話，容不得半點批評或異議？1983年，周揚宣講「人道主義與異化」問題引發學術上的爭論，馬上就被毛主席生前最青睞的秀才——胡喬木作為「清除精神污染」的口實，在全國大行「清除精神污染」的政治運動，硬是讓「文革」餘生的周揚認錯後才放他一碼。學術上的爭議，常被上升到政治高度，說什麼「反黨」、「反國」、「反人民」、「搞自由主義」，恨不得「打倒在地再踏上千萬隻腳」，置之死地而後快。這一點，張老最反感。

1987年，在天津的一次學術討論會上，教育部政教司的一位副司長就批評張靜如、李新、陳旭麓、姜義華（均是學界耆老）在《革命史資料》上發表的文章有自由化傾向，是「資產階級的史學觀」，打著「忠於黨」的旗號來反所謂的「自由化」，這本來就是一種愚忠、一種無知、一種「低級趣味」。所以10多年後張老編《文存》時，仍忿忿不平：「該人的批評，純屬胡說，反映他無知。」不久，張老們又惱火了一次，原因是政教司司長「做事太絕，不講道理，硬把文科與理科對立起來，好像我們犯了甚麼錯誤，真是胡鬧。」所以，張老後來再也不參加這類會議了。偶爾盛情難卻，就只寫文章捧捧場。

做學問難！做體制下的學問更難！做一個有開創性、有良知、有正義感的學者難上加難！

看「評文紀事」，固然有對學者真實心懷的欽佩，但尤有「江洲司馬青衫濕」之慨！

學術自由與現代文明已經成了悖論！

皮學軍 男，1970年生，湖南益陽人，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，研究方向：當代中國。

《二十一世紀》(<http://www.cuhk.edu.hk/ics/21c>) 《二十一世紀》網絡版第十七期 2003年8月30日

© 香港中文大學

本文於《二十一世紀》網絡版第十七期（2003年8月30日）首發，如欲轉載、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，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。